



# 作家的自然成长



我的个人简历中总是强调曾在天山10年，同时还强调曾执教于伊犁州技工学校，这10年对我太重要了。技工学校对我没有太多要求，我头上没有普通中学语文教师最紧张的高考指挥棒，没有教学大纲，只要学生喜欢，我爱怎么讲、讲什么学校都不管，我自己编教材，《论语》《老子》《孙子兵法》《曾国藩教子书》，唐诗、宋词……技工学校重实践，实习机会多，我带学生跑遍天山南北。这种自由的方式使我直到现在也不习惯动笔前列出详细的写作计划，我无法提供一本书的大纲或让大作家来论证书的选题，这就是天山以及技工学校给我养成的沙漠方式——沙暴式的形散神不散。1995年以后我执教大学，教的也是边缘化的写作课，业余写作。个人生活质量与精神世界应该体现在业余状态，写作完全出自精神需要。

1995年底回陕西后，我过两三年就会回一次新疆，去跟群山、草原、大漠幽会。在西域大地上动辄七八个小时、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颠簸，巨大的时空交错，以至于我把故乡美丽富饶的关中平原也看成了“绿洲”。天山——祁连山——秦岭，那些地名在一脉相承的群山脚下一字摆开，伊犁、奎屯、石河子、乌鲁木齐、吐鲁番、哈密、河西走廊、兰州、天水、宝鸡、西安、关中平原，这不就是瀚海伸向中原的一块天然绿洲嘛。

无论从西往东还是从东往西，这条大动脉血脉相连，这就是李希霍芬博士所谓的“丝绸之路”。从来没有到过西域的云南诗人樊仲伟把沙子比喻为渴死的水。我曾经把沙子比作小米露珠，最终想到的是蚕卵，粘在纸板上的小米粒一样的卵，变成细小的虫子，慢慢长大……古人把戈壁沙漠称为瀚海，蚕就是海中鱼。我一直把维吾尔人的达甫手鼓看成沙漠的缩影，邦邦的手鼓声就是爱情来临之际的心跳，心灵飞翔如鸟，翱翔如鱼，柳宗元与毛泽东的诗文都把水中鱼喻为翔于空的鸟。西北民间剪纸的经典图案就是鱼，农村妇女过年时献给灶王爷的是一条鱼馍馍。信奉喇嘛教的藏族、蒙古族把鱼视为神物，鱼通神灵，他们是不吃鱼的。鱼被各族人民高度抽象成一种生命哲学。

鱼生存的那些河，那些大西北的河有那么强

悍坚韧的生命力！我很荣幸小时候在姨姨家学会了游泳，俗称凫水或打漂水。每年暑假我都要去她家待一段时间，后来一条水泥大渠——北干渠把我们村一劈两半，我就很少去了。北干渠干净方便，县城的公家人也喜欢到北干渠游泳，但很危险，有桥的地方才有台阶能上岸，多少人错过了桥边的台阶被淹死了。我曾经几次脱险。再次去姨姨他们村子的河里凫水，真正体会到河的温暖与自由，爱在哪里上岸就可以上岸；游累了，往浅滩上一躺，水草、鱼儿、青泥、岸边的树……自由随意，完全没有水渠的机械刻板单调，水渠的目的性太强，太功利化、太实用，它的水是流不到大海中的。水是有生命的，从泉到溪到小河到大河到海洋。普希金把大海喻为自由的元素，与普希金差不多同时代的曹雪芹把女人比做水，女人最完美的生命状态应该是河流的状态，最终融入大海。

我这个生活在西北内陆的农家子弟，直到2003年40岁的时候才见到大海，一年之内见了两次，一次海南岛一次广西北海，可以想象我有多么激动。我的游泳技术只能让自己在浅水区品尝一下大海，仰躺在海面上，大群的海鸥从天而降，就像长翅膀的羊群，海浪很容易让人想起天山草原的草浪和瀚海里的沙浪。这种巨大的想象也只能来自西域大地，一匹马从马驹到成长为年马要换几次颜色，枣红马会成为白马或大灰马，绝对的魔幻现实主义。内地读者视为浪漫主义的东西在西域基本是写实主义。神话传说、歌谣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。

2009年夏天写完《生命树》，一周后我去到西天山伊犁河畔，2010年春天又赴希腊参加国际书展，在爱琴海边朗读《生命树》的片段。《生命树》是“天山系列”中神话传说最密集的一本书，也是大面积写女人的一本书。《西去的骑手》基本上是一本男人的书，女人零星闪现如泉眼；《乌尔禾》里的女性如同荒漠里的小溪；《大河》写额尔齐斯河，女人才是真正的大河；《生命树》几乎囊括了泉水、小溪、河流、大海的所有生命形态。

在爱琴海边朗诵《生命树》很有意思。爱琴海意味着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，《伊利亚特》和《奥德赛》的核心是女人，盲人荷马对女性的肯

定与赞美给西方文学打上了永恒的女性引领上升的底色。神话给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浪漫主义特有的巨大的想象力，想象力是一种创造力，一个民族的黄金时代也就是想象力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扬的时代。神话的另一大贡献就是让人类走出愚昧，走向科学、走向理性。神话与迷信最大的区别就是迷信让人盲目顺从、认命，丧失主体意识与个人意志，进而丧失想象力与创造力，而神话都是反抗命运，不认命。孔子很早就强调子不语怪力乱神，中国神话从此式微。汉儒纳入阴阳五行谶纬符命之说，儒学成为经学理学道学，迷信色彩越来越浓。中国历史上三个黄金时代都是儒学衰落，神话与浪漫主义高扬的时代，即所谓先秦思想、魏晋风度，“五四”精神。中国古典文学从屈原开始到《红楼梦》结束，从诗歌开始到小说收尾，都充满神话色彩，都是命运的反抗者，不认命。《红楼梦》可以说是“五四”的先声，发现、肯定并赞美女性的伟大，同时也赞美了儿童，大观园里就是一帮不想长大、不想结婚的小孩，以儿童视角看世界，女娲补天、精卫填海等远古神话在曹雪芹笔下复活了，林黛玉这个小女子流不完的泪是火辣辣的，是鲁迅《野草》里所吟诵的“地火在地下运行”毁灭一切又创造一切。这就是中国小说的野性精神。小说总跟封建社会过不去，小说是一种现代精神，浪漫主义大师庄子最先提出“小说”一词真是意味深长。

《生命树》出版时我才意识到近600万字的“天山系列”中，除去500万字的中短篇集子、长篇已有4部，完全可以称作“天山长篇系列”。《生命树》里4个女性的命运激活了我的童年记忆，小时候在关中渭北老家一位少女被流氓所骗，怀孕嫁到我们村，跟《生命树》里的马燕红一样，可她没有马燕红那么幸运，她疯了、死了，这是我最新长篇《好人难做》（《当代》2011.3）的核心故事，《好人难做》同样以关中西部古老的神话与当下生活相融合。神性是人性的最高体现，丧失神性，人与木石动物无异。11世纪喀喇汗王朝伟大的诗人哈斯哈吉普在《福乐智慧》中说：“人不为贵，人性为贵。”这个人性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孜孜以求的“神人”结构中充满了神性的真正的“人”。

□红 柯

今年是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举办10周年。10年来，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的关怀和指导下，鲁院成功举办十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，其中包括少数民族作家、文学评论家、文学报刊社主编、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家、儿童文学作家等各种类型的高研班，先后有861名学员在这里集中学习。在高研班之外，鲁院还与中国作协团体会员单位、各大文学网站和有关高校合作，举办了若干省市区或跨省市区的中青年作家培训班，如网络作家、网络文学编辑培训班，全国公安作家研修班，中青年作家外语培训班等。10年间，进入鲁院学习深造的各类学员已逾千人。这是当下中国文学界最富生机活力、最能代表未来国家文学面貌的一支文学人才队伍，他们的成长与崛起，已经构成中国文坛一道令人瞩目的景观。

对中青年作家的关注，不应仅限于他们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，还应延伸到他们走出鲁院之后的创作实践中。学习成果的转化，有待于在此后的文学活动中去实践，去表现，发挥鲁院高研班教学的纵深效应。《文艺报》“文学院专刊”的出版，便是其中措施之一。

《文艺报》“文学院专刊”每月出版两期，每期四版。“文学院专刊”发表有关鲁院高研班学员创作的研究评论文章、学员创作谈、有关学员的消息动态、学员新作等。这是一所不设围墙的文学院，一所借助报纸传媒时刻贴近中青年作家的文学院，是全体鲁院高研班学员的乐园，也是关注鲁院高研班文学培训教育、关注中青年作家成长的所有文学理论家、评论家发表研究成果的乐园。“文学院专刊”的追踪研究对象也将逐渐扩大到其他培训班学员，体现鲁院多功能的文学培训和文学教育特色。

期待历届鲁院学员积极参与，让我们以“学员”的名义再次集合，携手办好“文学院专刊”。

以『学员』的名义集合

□白 描



红柯，作家，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第一届学员，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、冯牧文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等。主要作品有“天山系列”长篇小说《西去的骑手》《大河》《乌尔禾》《生命树》等，中短篇小说集《美丽奴羊》《跃马天山》《太阳发芽》等，另有小说《阿斗》《家》《好人难做》等。

## 恍惚、童心及其他

——谈红柯写作的三个维度

□岳 震

什么都叫他好奇。他固执地要寻找这片土地的意义，寻找儿时梦中的英雄，热血在胸腔里轰鸣，利刃即将出鞘，寒光闪闪，征服了多少人的心。于是，就有了《西去的骑手》《金色阿尔泰》《库兰》。我敢说，这些都是他微醺时的作品，也是他最好的小说。

一个恍惚的人，大概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一点，因此这几篇小说都有着大致相同的结构模式，两条线齐头并进，互为反衬，互相说明，在穿插的讲述过程中，一种与这片土地相匹配的强悍的生命意志呼之欲出。

《西去的骑手》宛如一杆秤，一端是癸司令马仲英的人生传奇，一端是一代枭雄盛世才的政治谋略，中间那个支点，就是头屯河之战。这部小说的主题并不复杂，按照红柯的说法，“我当时想写西北地区很血性的东西。……我在马仲英身上就是要写那种原始的、本身的东西。对生命瞬间辉煌的渴望。对死的平淡和对生的极端重视。”要抵达这一目标，红柯启动了四种叙事策略。第一种是战争。他写战争，固然也写了战争之残酷无情，但战争在他眼里更多的是一种“奇观”。在这辽阔而荒凉的土地上，是战争成就了神采飞扬的生命。譬如，头屯河之战便将马仲英的军事生涯推向了高峰，这场战争在小说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渲染。第二种是骏马。“西去的骑手”如何能没有一匹与骑手精神相契合的马呢？大灰马在小说中反复出现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骑手的精神象征，是英雄不死的魂灵。如血的夕阳、青纯的海水、奔腾而出的大灰马，就有了几分苍凉和悲怆，隐隐然，营长的垦荒之举说到底也是想使自然成为适合生存的环境。可另一方面，征服者在征服过程中也实现了自身的改变。最典型的莫过于成吉思汗，小说极写他的柔弱反对自然的敬畏之心，是自然让他成为脚踏着坚实大地的英雄。征服自然与敬畏自然，在这篇小说里构成了奇怪的悖论关系，却又那么熨帖、自然，这是红柯独特的发现。

雄少年，也经由他的叙述，长久地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。

中篇小说《库兰》依然延续了两条线索齐头并进的叙事结构。小说的主线是俄罗斯军官阿连阔夫失败走新疆的生活，暗线是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五入中国的传奇经历。阿连阔夫人生的开头宛如童话，养精蓄锐的英勇少年等待着生命的再一次辉煌。然而，阿连阔夫却折戟在富饶美丽的伊犁。这或许是因为马背上颠簸的生活敌不过平静安宁日子的召唤，或许是因为哥萨克马刀不敌清静无为的老庄哲学，恐怕最重要的是被历史所抛弃的英雄注定了无所适从，也注定了无法用“旧王朝的力量适应新世纪的太阳”。普尔热瓦尔斯基同样在美丽的伊塞克湖畔埋葬了他的探险生涯。从对自然的僭越到屈服，就像他最后说的，“仅有这点淳朴之地或许是神灵的一种敬畏吧”。或许，库兰才是这篇小说真正的主人公。

中篇小说《金色阿尔泰》俨然是一部“创世纪”，只不过这一回，明暗两条线索的时间距离足够大。一条线索的时间距离足够大。一条线索的主人公是营长，他奉命带领士兵到阿尔泰山；另一条线索的主人公则追溯到成吉思汗在阿尔泰山的启悟。英雄的定义在此发生了变化，在这片严苛的土地上，以一己之身与自然互相凝视的也是英雄。有意思的是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颇值得玩味。一方面，人类要征服自然，营长的垦荒之举说到底也是想使自然成为适合生存的环境。可另一方面，征服者在征服过程中也实现了自身的改变。最典型的莫过于成吉思汗，小说极写他的柔弱反对自然的敬畏之心，是自然让他成为脚踏着坚实大地的英雄。征服自然与敬畏自然，在这篇小说里构成了奇怪的悖论关系，却又那么熨帖、自然，这是红柯独特的发现。

二

还有一类小说则直接打开了红柯生命的另一面——孩童之心，我所说的童心不限于“一念之本心”，更有艺术构思上的若干特点。

首先是景象。孩童之心一片澄澈透明，对世界的发现，往往是一个又一个画面，因此视觉性画面是红柯构思小说的起点，这在他的一系列短篇小说里有较分明的呈现。在《奔马》中就有这样一幅画面：一阵疾风在山路上呼啸而过，渐渐地，这阵风开始显露马的形状，从根根飘扬的马鬃，到马头马身马蹄，直到圆圆的后臀。大灰马一径奔跑着，淬火的阳光从马身上抚过，迅速化

作点点金色的尘埃，簌簌飘落。在大灰马身边，是乌亮乌亮的汽车。大灰马和汽车并肩而行的意象唤起了整个故事。《美丽奴羊》中占据画面中心的，是一只眼睛里有柔美绵软的亮光的羊，它静卧在牧草地里，眼前那个还带着满身血气的汉子，就在这绝美面前栽倒在地。红柯十分注重色彩的运用，每幅画面的颜色都十分饱满、纯净。在这些画面中，没有单一的人或事，都是由人与物或者物与物构成某种关系。这就涉及到红柯短篇小说构思的第二个命题，即关系。

关于“关系”在小说中的意味，铁凝已经有了很精到的发现。作家因禀赋不同、性格不同，所表现的“关系”也各有所异。红柯所发现的关系就有其独到之处。在《鹰影》这篇小说中，孩子和鹞鹰的关系就十分动人。孩子救了受伤的鹞鹰，从此，鹞鹰就将飞翔的梦想深深植于孩子的心底。于是，孩子在无穷的想象中展开了鹰的故事，他甚至开始模仿鹰的姿态、鹰的气势。孩子与鹰的关系引出了孩子的父亲与鹰的关系，事实上，父亲也遇到了命定的那只鹰，“完成了命中注定的飞翔”。于是，孩子与鹰的关系转化成孩子与父亲的关系，孩子对鹰的模仿透露出孩子对父亲的无限怀念与向往，小说被灌注了巨大的情感能量，却以一种极为节制的方式小心翼翼地洒落出来。

在红柯所“见”的景象中，还有一个重要特征，即注重留白。正是在空白处，意味如炊烟冉冉升起。比如《四棵树》，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做“四棵树”？红柯借孩子之口给出了不同的版本。第一个版本是人和熊的故事，熊被人打了以后，人和熊围着树兜圈子，人比熊快，可是熊的利爪要了人的命。第二个版本，是四棵树被人砍了两棵，还剩下两棵。第三个版本是两棵树，第三棵是熊，第四棵是杀熊的，人和熊都是英雄。第四个版本是两棵大树，土地是第三棵，草原人的祖先乌古斯汗是第四棵树。在这四个版本的变化过程中，人和熊的关系慢慢变成了英雄与土地、与树木的关系。那么，这种变化是如何在孩子的讲述中发生的呢？这种发生又给予了孩子什么样的影响？小说结尾处的蓝光又有怎样的象征意味？这一切，红柯都默然无语。诗意就隐藏在这些空白之处。

三

红柯作为一个写作者，不能固守一隅，也不能只有一种风格。风格，往往因为所写的题材不同而有差异。除了有关西域大漠的小说之外，红柯还尝试

了另外几种途径。

第一类是历史小说写作，以《阿斗》为代表。以阿斗的视角来解读三国，确实令人耳目一新。阿斗自有愚人的生存智慧，在他看来，没有什么比快乐生活更重要的了，以此为出发点，他一点点评三国人物，虽荒诞不羁，却也不乏真知灼见。红柯模仿阿斗的口气说话，倒也活灵活现，问题在于，他太急于让我们看到阿斗后面的红柯了。理念过于强大，相对单一，又缺乏相应的细节来夯实与加强小说的说服力，就很容易流于论说而失掉趣味。

第二类是开掘日常生活的诗意，以《乌尔禾》和《生命树》为代表。在这一类小说中，红柯开始了以讲故事为核心的探索。这种转变，暗示着作家世界观的某种变化。在日常生活叙事中发现诗意，正是他所要做的事情。相比之下，《乌尔禾》的尝试更为成功一些。小说基本依据时间的线索，叙述了王卫疆的成长历程，连绵不断的叙述赋予了小说从容的节奏。更重要的是，红柯再次依托人与动物的关系实现了普通人心灵的升华，这一转变的发生自然妥帖，臻于化境。《生命树》在叙事上则稍显凌乱。如何处理好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的嫁接问题，将是红柯需要去面对并不断探索的课题。

当下，红柯又将目光回视到渭北平原，讨论他目之所及的知识分子问题，这就是他最新发表的长篇小说《好人难做》。王岐生、薛道成、马奋楫们都要面对各自的人生困境，这固然可以看做是知识分子难以回避的自我认同问题，未尝也不是每个人所面临的文化危机。红柯寄希望于失落了的传统文化能安顿人的身心。这不失为一个美好的愿望，但是否真能有效，还有待验证。在这里，作家的思想问题再一次浮出水面。它不依赖于概念和逻辑的演绎，却必须穿越重生生活的屏障，去寻找有关生活的真理。对红柯而言，当他决定褪去少年热血与激情的外衣，去书写他的故事时，就决定了他踏上了攀升精神高峰这一困苦的旅程。

红柯以他全部的作品，打开了自身生命的若干向度。对于西域大漠，他以绚烂多姿的文字召唤出人们对于英雄与血性的向往；对于整个存在世界，他又宛如孩童，捧出了一幅幅简单中蕴涵复杂、素朴中不无深意的心图；作为讲故事的人，他纯熟老到地叙述经验世界的种种，表达着他从生活中不断获取的真理。红柯的小说世界的疆域正不断开拓着，谁也无法预言，它究竟通向何方，又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风景。